

《佛國記》因譯研究與傳播（三）

許尤娜

貳、一八三六年法文《佛國記譯注》

的典範意義

一、蘭德思《佛國記譯注·導言》要點

《佛國記譯注》書前六十六頁〈導言〉，由雷慕沙弟子蘭德思（C. Landress）執筆，承載早期歐洲佛學研究的豐富訊息；然而截至目前中文佛教學界關注甚少。筆者曾據友人英譯整理箇中要點，例證雷慕沙《佛國記譯注》對漢傳佛學研究的開新之功。這裡略述其要點。

蘭德思〈導言〉可大致分為以下三部分：

其一，前二分之一，蘭德思細述其師雷慕沙之卓越學術成就與佛學研究貢獻，²特別是他以科學的客觀方法和宗教的寬柔精神，廣研東方語言文獻，從而發現「漢語文獻」帶有精確特性，能彌補印度史地文獻之闕。此中復追溯雷慕沙之前的歐洲佛教研究成果，以及其局限性。例如第3頁提到：「二十年前，當雷慕沙先生開

始對佛教感興趣時，並無模範前輩可追隨，亦不能指望前賢指引協助。這個著名的宗教當時幾乎未見論文研究，只有將荒誕事實整理收集，或胡亂連結。其道德與隱喻特質並未得到太多關注。」³

其二，從第三十四頁轉入主題《佛國記》，先述《佛國記譯注》（Le Commentaire sur FOE KOUÉ KI）在雷慕沙漢學及佛學研究上的特殊地位：集成之作，將分散在各處的漢語佛典研究，包含佛教信仰、歷史、佛教國度描述，整合在這部作品；亦是其他研究之補充。於此指出雷慕沙驚訝於中國本地對《佛國記》的冷淡態度，他不但一反清廷史官之見，對這份宗教行記予以最高重視；並一反西方本位的優越意識，明確指出：「中國人絕非無知。他們遠在我們成功抵達好望角之前，就已成功遍遊亞洲，擁有豐富的地理學識」（頁二十六）。

從四十頁第一行到第六十二頁，集中說明法顯其人及《佛國記》其書之價值。雷慕沙將《佛國記》放置在「世界文化發展史」範疇，指出這部五世紀印度求法行

記的重要性：「在人類智慧發展史上，有什麼比追索這個朝聖行旅的進程，更值得關注？」（頁四十三）進一步將法顯《佛國記》與《宋雲行記》、玄奘《大唐西域記》對比，揭示《佛國記》在漢僧求法行記中的超勝地位，高度肯定此書在記錄歷史時間、地理方位的不可思議的精確特性。這種精確性恰是印度文獻所闕——後者歷史時間不明，且常有篡改之虞（頁四十九）。

頁五十二提到了此書在明代的刊刻、清代的評價，指出後者的偏頗，強調《佛國記》的價值：「明代有胡震亨和毛晉的評論與刻版。我們現在所用版本是依皇家圖書館三〇四卷（*la Bibliothèque du roi, Fourn. CCCIV*）（筆者按：《四庫全書》），這是兼含哲學、史學、文學各種主題的一個總集，雷慕沙先生比對後，發現《四庫全書》視此書為謬誕之作。這是《佛國記》在中國的名聲。然而，科學家與學者都認定它是最佳參考書，在關於西域史地的書目匯編中，沒有不部分引用或全部引用此書者。它也出現在《康熙字典》，其中所引全是上乘作家之文。（頁五十二）」

除了宗教、史地文獻價值，雷慕沙更關注到《佛國記》在書寫上的「風格」特徵。〈導言〉二次提到：法顯《佛國記》具有一種「樸實簡潔」的寫作風格：

法顯的風格是樸實簡潔。雷慕沙先生在翻譯時，力求逐字逐句貼緊原文，誠摯地保持文本的信達與完整。即使是最簡單的語彙亦不含糊。例如，法顯用語是：「從此行：（我們）來到另一地方」，這裡「地方」是指「他」到達的「國家」。（頁五十二）

《佛國記》的風格非常簡樸，所以本身不難讀；但這位求法者最鍾愛的主題卻是我們所不熟悉的。他對自己的主題瞭若指掌；他的讀者也都熟悉這些掌故。佛陀生平及其時佛教聖者遺物、偉大事件、品格風範，常常僅用一個單詞表示，這個詞能勾起深諳經典的佛教徒的記憶。我們卻僅僅透過其他語系得知一些傳說，因此對這樣簡要的表達，往往感到困惑。書中有許多修行語言、儀式用語、寺院生活的行話，所以讀這本小書還真是一个挑戰。（頁五十四）

其三，〈導言〉最後第六十三頁到結束頁六十六，蘭德思以三頁篇幅，扼要說明《佛國記譯注》如何經歷波折方得出版。此中提及史地學專家克拉普羅斯以其廣博學識接續第二十二章起共十二個章節之注釋、他對雷慕沙之拼音作了一些費解的更動。另外，提及布努夫及 M. Jacquet 在佛教教義及梵文音義的協助（頁六十四）。蘭德思特別提到，布努夫之佛教研究常得雷慕沙引用

；他並透過經濟及學術協助，全力支持《佛國記譯注》出版事宜，此書才能順利問世（頁六十五—六十六）。

〈導言〉頁三十八—三十九，詳述印度佛教如何東傳中國，提及衆多梵僧之名。例如：公元前二一七年第一個到中國弘法的天竺僧釋利房（Chi li fang）帶著經典與十八位僧侶東來；又如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漢帝派人往天竺學佛；以及六十年後東漢明帝夜夢佛身，遣人西行求法，帶回兩位天竺僧，⁴自此佛教正式傳入中國。自公元二世紀起，許多西域高僧到中國弘法，建佛寺、教梵語。公元二五七年，一位漢僧⁵遍遊小布哈拉（petite Bokhara）；二六五年，一位月氏僧人，歷遊西域諸國尋訪佛典，帶到晉地譯成漢文。⁶雷慕沙曾於《世界傳記》（Biographie universelle）發表〈佛圖澄〉論文，指出佛圖澄在公元四世紀初，以神通力吸引大批弟子，聲名遠播；而天竺來華高僧如僧伽提婆、佛陀耶舍、曇摩耶舍、鳩摩羅什等，都沿「佛圖澄之路」，東來漢地弘揚佛教。

頁四十一—四十一聚焦特寫作者「法顯」，詳述法顯佛學背景、法號、成書因緣及時間。「寫這本佛國記的僧人，屬於（長安）鳩摩羅什僧團……他唯一被記得的名字是『釋法顯』，或簡稱『法顯』，這個法名意謂著

『彰顯佛法』」。雷慕沙在正文第一章的注解中，以三個註解（註一、注五及注十三，見頁一、四、六），分別解釋主角「法顯」、長安四名同契「慧景、道景、慧應、慧嵬」、及張掖五位同志「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的法名內涵。這種慎重其事解釋名字的方法和態度，啓發後續西方漢學研究者關注僧人法號意蘊。筆者以為，這也提醒了漢文母語的讀者，若將這些習以為常的漢字，置於「佛教」背景，以一種關連於佛教義理或教法的角度，重新觀看，則對漢字在新文化脈絡所連結的新訊息，或許將有不同的感知與理解。

不過，在上面這一小段文字中，也可看到雷慕沙對法顯的歷史背景之理解，未必全然正確。例如法顯的師承、《佛國記》成書動機和時間，明顯有誤：「依其師長鳩摩羅什要求，以及圓滿道友之願，他寫下這份行旅回憶錄」；「他的遊記完成於劉宋時期，也就是說，在西元四一九年之後」（頁四十）。依據《高僧傳》，鳩摩羅什被姚興迎至長安是在四〇一年，而法顯於三九九年已啓程離開長安；兩人並未交會。而依據《佛國記跋》，成書不晚於東晉義熙十二年（公元四一六年）。

綜言之，蘭德思〈導言〉至少指出雷慕沙對《佛國記》三個重要觀照。

第一，觀照「作者」生平及信仰。這在後來

一八六九、一八七七、一八八六年三種英譯皆有傳承。

例如：畢爾在英譯文本之前先簡介法顯生平；翟里斯在其譯文之後附錄《四庫全書總目題要》關於法顯及此書簡介之英譯；理雅各在其〈序言〉點出法顯可敬的內在性格——志性明敏，這與雷慕沙看重作者法顯其人性格一脈相承：「他是一個正直的觀察者，遊記中未曾穿插任何自己發明創造的故事。」（頁五十二）

第二，觀照「文本」敘述風格。雷慕沙格外關注《佛國記》的「簡約風格」：「法顯的風格是樸實簡潔」（Le style de Fa Hian est simple et concis. 頁五十一）；「《佛國記》以一種極簡方式寫成」（est écrit dans un style très-simple. 頁五十四）。較細膩的說明例如：「在探險中他依循一種清明感悟，及一種自覺信念。以此，他未曾美化事實，未曾隱藏環境條件，即使他有意於美化或隱藏之。他看到什麼，就報導什麼；若是別人轉述的，他也會讓我們知道。」（頁五十三）筆者認為，雷慕沙對《佛國記》「簡約」風格之認識與強調，除了來自他個人深厚的漢語造詣，可能與沈士龍「玄致簡盡」、《四庫全書》「敍述古雅」之評語啟發有關。⁷

其三，觀照「作者與作品」之關聯，亦即，將作

者內在高尚品格與作品古雅格調作對應。中國傳統史傳本以「人物」（而非事件）為書寫重心，雷慕沙作為「漢學家」，恰如其分地進行同情的理解；對作品中的真摯情感深有洞察：「我們發現一些深層的虔誠因素，鼓舞他的求法志業，激發他的觀看與述說方式。」（頁五十三）；「人類的一切弱點並未在這位僧人身上沈默。然而這些弱點卻讓我們更賞愛他；更激發我們對他的同情、對其言行舉止更感興趣。說到他自己受的苦，他不誇大，表達得不卑不亢，謙抑不俗。」（頁五十三）

「書中描述了九死一生的險難：穿越印度高加索最險絕的隘口；為死於喜馬拉雅山雪地裡同伴所掬的悲慟之淚；在斯里蘭卡因遇漢地同伴而悸動；他的航海故事；暴風雨中的恐懼及其他段落；都是深撼人心的時刻。」（頁五十四）雷慕沙在客觀理解史地訊息之外，沒有忽視作者的宗教熱忱、身體苦痛、情感脆弱、死別傷慟、蒙難恐懼等內心情感表述；反而充分肯定這些苦難中的人性弱點——它們映襯出求法者高貴的宗教情操。這種文學抒情的觀照，中文學界如章巽、楊維中皆有進一步闡發。

蘭德思這篇〈導言〉扼要介紹十九世紀初歐洲漢傳佛教的研究概況，指出雷慕沙《佛國記譯注》對歐洲佛

學的特殊價值，總體介紹《佛國記》相關背景，包括時代佛教環境、作者生平、作品風格乃至情感意蘊。下面筆者實際進入法文譯注的正文，取第一章為例，觀察雷慕沙如何為「漢僧求法行記」建立注解範式。

(未完待續)

註釋：

1. 很遺憾筆者目前尚未親見《佛國記譯注》實體書籍。
2. 在〈導言〉中至少提及了雷慕沙幾部重要的中國研究：一八一一年的《研究中國外來語札記》；一八一二《東亞五種用語詞彙》；《匈奴傳研究》、《佛教徒的宇宙圖像和宇宙起源學》。並提及佛教文獻佛教神話的形上學及魔法般的語言，難度十足，對雷慕沙卻是意趣橫生，讓他重新整頓思維，帶他遠離喪母之慟。
3. 筆者譯自《佛國記譯注·導言》，頁一一一。法文原文頁碼皆為羅馬數字，以下筆者為行文流暢故，多半
4. 依慧皎《高僧傳》，開卷〈譯經上〉第一二人，漢雒陽白馬寺攝摩騰與竺法蘭。
5. 〈導言〉未言其名，筆者考慧皎《高僧傳·譯經上》，應指朱士行。參見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六，二刷），頁一四五。
6. 〈導言〉未言其名，筆者考慧皎《高僧傳·譯經上》，應指竺法護。「竺曇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為師。……是時晉武（公元二一六五—二九〇）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外。護乃慨然發慎，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中，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齋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為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讚》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勤。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參見湯用彤校注《高僧傳》，頁二十三。
7. 雷慕沙既知胡震亨刻本，且批判了清朝館臣對《佛國記》的負面態度，對二書中沈氏及紀氏的這兩筆品評應不陌生。